如何看待当前社会主义问题

杨家祚

随着东欧苏联的剧变，西方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学者欢喜若狂地大肆宣扬“社会主义失败论”、“社会主义已经死亡”、“凯恩思主义战胜了马克思主义”等等，他们发誓要“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新的世界战争”，以在世界上“彻底埋葬共产主义”。面对这一严峻的国际形势，如何看待当前社会主义问题，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观察当代社会主义要坚持两个基本观点

社会主义自本世纪初由理论变为现实以来，是在曲折、坎坷的道路上前进的。它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也出现过挫折和失误。正如列宁说的那样：“历史通常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估计历史的最复杂和最离奇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①

笔者认为，观察当代社会主义问题，要坚持两个基本观点：一是由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所揭示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历史逻辑，是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由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普遍规律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必然性。二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极其艰难、曲折、复杂和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基本观点是紧密联系、辩证统一的。没有第一个基本观点，就不可能从世界观、历史观和人生观的根基上建立对社会主义和人类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念。没有第二个基本观点，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看作是没有曲折的、排斥任何偶然性的纯粹的必然性，就会在顺利面前盲目乐观，急燥冒进；或者在挫折面前悲观失望，乃至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确立这两个基本观点，实质上是要求人们在观察当代社会主义问题时，在立场、观点、方法上，要符合事物发展的两个客观规律。一个客观规律是，一切事物都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阶段上。资本主义和以往任何社会形态一样，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它必然要向更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这是不以任何个人、阶级、集团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趋势。本世纪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由一国到多国的发展；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对人类进步与世界和平作出的伟大贡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40年的巨大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伟大

成就，这一切都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是不可阻挡的，社会主义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因此，我们在观察当代社会主义问题时，不应为它当前的暂时挫折而忘却这一历史的客观规律。

另一个客观规律是，任何复杂事物的发展，特别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笔直的，而是曲折的，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也必然是这样。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中，曾借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个形象比喻：“政治活动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②，来说明革命道路的曲折性。曲折性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自然界的发展是这样，人类社会的发展更是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不可能不遭到旧的势力的反抗，出现曲折乃至暂时倒退和旧制度的复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于1640年爆发，1649年处死国王查理一世，推翻斯图亚特王朝，成立共和国。1653年资产阶级拥立克伦威尔为“护国主”，由于实行军事独裁和反人民政策，导致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达28年之久。1688年资产阶级通过宫廷政变（所谓“光荣革命”），与贵族妥协建立君主立宪制，才使资产阶级专政稳定下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由于它联合了第三等级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所以它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相比，要壮观、彻底得多。但是，它同样也经历了一个反复、曲折、复杂的斗争过程。从1789年革命爆发，到1875年第三共和国成立的86年间，法国资产阶级依靠人民力量，先后7次同欧洲封建势力的反法联盟反复较量，中间出现过两次波旁王朝复辟，才最后确立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英法两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曲折性，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以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巩固尚且如此艰难曲折，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其艰难、曲折和复杂性更是可想而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会有迂回和曲折，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历史活力和蓬勃生机。仅仅看见某些旋涡和逆流而看不到历史长河的奔腾，只能说明观察者的政治短视。”走历史曲折之路，是每一个社会主义者应有的思想准备。

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复杂和漫长的历史过程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③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和任务高度而深刻的概括。要在全世界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人类历史上极其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当今世界仅有少数几个国家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战后，现代资本主义通过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关系等方面的一系列调整，生产力有了比较快的发展，还表现出相当的活力。已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正如毛主席所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些国家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着繁重的经济建设任

务。要在这些国家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及其再产生的条件，必须对旧的社会基础进行全面深刻的改造。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丰富的物质财富，逐步实现由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新社会，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和公正；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文化、道德素质，改变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等等。这些艰巨任务的完成，必须经历一个曲折、漫长的斗争和创造过程。

总之，要从三个方面理解社会主义的长期性：一是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长期性；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对立、斗争和共处的长期性；三是社会主义自身历史发展阶段的长期性，即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长期性。可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所以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漫长的历史过程，最根本的原因是由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它所要完成的艰巨、复杂的历史任务决定的。

三、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增加了这一历史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马克思恩格斯当初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同时发生并取得胜利，然后在这些先进国家的帮助下，落后的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说："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一个国家内发生呢？答：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④而历史的实际进程是，社会主义革命不是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而是首先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那么，是不是这些国家因为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落后就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等到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再进行革命呢？或者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呢？当然不是。这一点，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在同考茨基、苏汉诺夫等人的大辩论中，已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由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确实又给这些国家的党和人民在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来了一系列难度很大的新课题，增加了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发展的艰难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第一，由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这种落后状况又不可能随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而立即改观，这就必然造成一种局面，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科学技术上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931年2月4日，斯大林在题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的讲演中说："我们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在革命前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的苏联尚且如此，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更是如此。这种状况就使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方面的优越性，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全面、充分的发挥，使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缺乏强大的物质吸引力。相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丰厚物

质生活条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人却产生了很大的诱惑力。这不仅增加了我们思想政治工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艰巨性，也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其经济实力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和进行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就增加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交往中的复杂性。

第二，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给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带来了改造小农经济的艰巨任务。淘汰小农经济本是人类历史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应完成的任务，现在却落在了社会主义的肩上。今天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小农经济已微乎其微，而在已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革命胜利以前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要把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小农经济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任务十分艰巨复杂。尤其是象我们中国这样小农占绝对优势的国家，任务更为艰难，要花更长的时间，费更大的气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实践经验也表明，它们在经济建设中，搞好工业固然不易，而要搞好农业，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需付出长期而艰辛的努力。陈云同志说：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农不稳。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重大社会问题，无不与农业这个“稳”字有关。

第三，经济文化落后还影响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生活建设的进程。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为实现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社会制度的根本保证。但经济文化的落后，又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生活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长期的封建统治，留下来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东西较多，而民主法制的东西较少，使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影响着新型的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形成以及社会主义民主生活的发展。十月革命后，列宁在谈到苏维埃管理部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时说：“在这里，我们苦于俄国资本主义的不够发达。在德国，大概这种痛苦要轻一些。因为德国的官僚机构受过很大的考验，它迫使官僚们绞尽脑汁，真正做事情，而不像俄国办公室里的一些人那样，坐在安乐椅上安闲度日”⑥。邓小平同志在批评我们一些干部搞特权时说：“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⑦

二是经济文化落后，制约着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普通劳动者充分行使其当家做主人的民主权利。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人的国家，我们党和政府一贯重视和珍惜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实行男女平等；年满18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国政府还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确定了适合自己国情的选举制度，等等。这一切都表明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人民特别是在旧中国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广大下层劳动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有法律保障的广泛政治民主权利，这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但是，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民主权利的充分行使要有一定的经济文化条件为基础和前提。一个人倘若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就很难想象他会有过多的精力和兴趣去关心投票选举等民主生活。

没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也很难参与国家管理机关的决策。可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仅是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的需要，也是发展科学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充分行使民主政治权利的需要。列宁曾指出："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⑧

总之，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要在人民政权建立后，改变落后的经济、科学文化状况，探索出适合生产力水平的经济文化发展的管理形式，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相当长的时间。

四、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武装颠覆与"和平演变"战略，增加了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发展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揭开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伟大历史序幕，开始了两种社会制度和两种思想体系的全面较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由一国到多国的发展，标志资本主义统治地盘的日益缩小，使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深深感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严重威胁。1953年，当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说："只要苏维埃共产主义统治着世界现有各国人民总数的三分之一，只要它设法至少把它的统治扩展到许多其他国家，我们便绝对得不到巩固的和平或者欢乐的世界。"他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个"笼罩着全世界的可怖的威胁，这个威胁强迫我们去做如此可怕的牺牲，使我们对未来存在那么大的恐怖。"杜勒斯的这些话，充分反映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和发展的恐惧心理。因此，尽管社会主义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一再表示愿意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相处和友好往来，但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却出自本性地一心要铲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推翻社会主义政权，消灭社会主义制度。这就迫使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来的70多年中，两种社会制度和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斗争，就始终没有停止过。最初，帝国主义妄图用武装颠覆的办法，把社会主义扼杀在摇篮里，这一图谋失败以后，他们便改变手法，采用"和平演变"战略，即在保持强大军事压力的前提下，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和交往中，运用战争以外的全部手段，特别是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特别是在共产党内扶植亲西方势力，促使社会主义国家从内部演变。因此，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就成为当今世界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主要形式，成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斗争中发生严重挫折的重要原因。

8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虽然由紧张转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特别是近一二年以来，虽然苏联东欧发生了巨变，但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事实仍然是一个世界，两种制度。这两种制度的长期共存和斗争，仍然是今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根本特

征。对此，我们在思想认识上不应有任何丝毫模糊。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其《1999年：不战而胜》一书中，以其一生政治、外交生涯的经验，极其鲜明地阐述了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以及美国追求“不战而胜”的企图。他这本书是1988年出版的，因此他仍把苏联作为代表与美国相对立的共产主义一方。这里较多地引用他书中的一些话，以便更清楚地了解对方的意图，增强我们反“和平演变”的意识。尼克松在其书中写道：“极权共产主义在本世纪初还只是一个策划于密室的阴谋，现在已统治着世界人口的35%”⑨。“苏联人追求的是不战而胜。我们的对策不应是不胜而和。我们也应追求不战而胜。但我们追求的是另一种胜利……是自由的思想对于否定自由的极权专制思想的胜利。”⑩“苏联人矢志不移地要实现建立共产主义的目标。我们则矢志不移地要实现建立自由世界的目标。……苏联人认为历史在他们一边。我们应确保在书写下一世纪的历史时，它是在我们这一边。”⑪

尼克松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料想到苏联东欧国家在他这本书出版后的一二年内会发生如此迅速而巨大的变化。所以，他在这本书中一再提醒美国当权者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要冷静观察，保持警惕。他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让苏联国内政策的变化影响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人认为我们应在军控谈判中作出让步，以‘帮助’戈尔巴乔夫在国内取得成功。照这些人的话办将是愚不可及的。”⑫他要美国当权者“以严格的标准衡量苏联各项改革的意义”，看“他们是否把政治和经济权力都下放？他们是否给苏联的非俄罗斯人更大的自治权？他们是否保护思想和宗教自由？他们是否解决东欧国家的卫星国地位？如果改革在这些领域打不开局面，对苏联的对外政策就不会有所牵动，西方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自慰之处”。他说：“一阵清新的微风正吹拂着苏联。我们还无法知晓其风力和风向。但哪怕只是青萍之末的自由微风也能使苏联高压的闷热有所缓解。因此，我们应对这一变化持欢迎态度，但对其意图要继续保持警惕。”⑬因为“严酷的现实是，两国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是针锋相对的”，“双方的抱负水火不相容”，“是极权主义文明和自由文明之间的斗争。”⑭

尼克松以其一生的政治经验指出：“我们不应自欺欺人地认为美苏紧张关系的缓和意味着矛盾的结束。”⑮“在核时代，我们的目标是和平。然而完美的和平——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是个幻想。它过去未有过，今后也永远不会有。”⑯“现实的和平不是矛盾的终结，而是要学会与矛盾共存在的一种手段。”⑰“因为美国和苏联都不会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念或牺牲自己的权益。”⑱他提醒白宫领导人，“我们不要回避领导世界的责任。”⑲“由美国扮演主角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我们退缩，我们就会把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拱手让给苏联；我们就会使苏联能安然地在这个世界上进行统治和扩张；……我们最终将发现自己成为赤色海洋中的一个孤岛。”⑳他敦促美国当权者，“我们应帮助那些正在为防止共产主义取胜而战斗和正在努力把已获胜的共产党赶下台的人。我们还应致力于改善其他国家的生活条件，以削弱共产主义口号的政治吸引力。”㉑

尼克松在这里毫不隐讳他的反共立

场。他对各种问题的分析，所提出的各种斗争策略和建议，都是从东西方长期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的角度出发的，都是为摧毁共产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他在这本书的最后还引用丘吉尔1946年在威斯敏斯特学院作“铁幕问题”讲演时的一段话作结束语：“此时此刻，美国在世界上的力量已登峰造极。对于美国民主来说，这是个庄严的时刻。因为实力最强者对未来也负有令人望而生畏的责任。”尼克松说：“这些话说于42年前，但今天仍然一样真切。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 世界的未来是否会永远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呢？也就是说，人类历史是否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就到头了呢？恐怕这只能是尼克松先生一种主观的美好愿望而已。因为资本主义无论它多么发达，毕竟是一种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制度，人类历史怎么会可能永远停留在资本主义这种剥削制度阶段上呢？一切进步的人们，特别是创造历史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怎么会容忍其子孙万代永远生活于无权的、时时受到失业威胁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呢？按照历史的规律，人类的未来必将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劳动、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势力的强大，它又不断地交替使用战争和“和平演变”的手段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竭力阻挠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这又决定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必然要经历一个极其艰难、曲折、复杂的漫长历史过程。当前社会主义所遭受的严重挫折，就是帝国主义阻止历史前进所造成的曲折的一种表现。

五、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失误，有的党内一些高级领导人放弃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得逞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重要内因

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是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总结概括出的一条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东欧的巨变，苏联的解体，中国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都深刻说明了这一唯物辩证法思想是科学真理。

东欧苏联的巨变，除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外，还有其多方面的深刻内因。重大内因之一是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失误。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壮丽而艰巨的事业，是新生事物。人们对它的前进道路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要经历一个长期反复的实践和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出现偏差甚至重大的失误，这就会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严重困难。但是，从当前社会主义所遭受的严重挫折来看，从东欧苏联的现状来看，严重的问题还不仅在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偏差和失误，而在于能否及时地正确认识、总结和纠正重大的失误。如果能够及时地正确认识、总结和纠正自己的重大失误，就能继续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把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否则，就会失去群众的信赖，使自己的错误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借以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口实，变为他们实现其“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因。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就在于它能以马克思主义的严肃态度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正确总结

了以往失误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创造性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证明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具有自我完善的强大生命力和蓬勃发展的生机。因此，只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能克服困难，继续前进。

原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党，虽然也较早地发现了以往工作中的失误，但却不能正确总结失误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纠正失误，结果经济日益恶化，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为缓解群众不满情绪，又不是依靠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力量，进行积极、正确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而是向西方大量借债，结果债台高筑。匈牙利1970至1979年，外债增加了700%，达82.31亿美元，1987年增加到177亿美元，1989年猛增到206亿美元，相当其出口自由外汇收入的326%。波兰1970年外债仅8亿美元，1980年增至235亿美元，1989年猛增到410亿美元，相当其自由外汇收入的5倍以上。民主德国从1973年起，外贸连年逆差，到1980年外债突破100亿美元，人均债务570美元，年债务利息约占全年对西方出口总值的1/4。与此同时，东欧一些国家通货膨胀日益严重。1989年匈牙利通货膨胀率为12—15%；波兰则高达1000%。由于物价猛涨，职工实际工资下降，更激起了群众的不满情绪。再加上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一些领导干部的特殊化、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的日益严重，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乘机利用经济援助手段，提出种种政治条件，逼迫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步步退让。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利用恶化了的政治、经济局势和人民的不满情绪，制造政治动乱，用修改宪法、自由选举等所谓“民主”手段，“和平”地瓦解了社会主义政权。

东欧特别是苏联发生巨变的另一个重要内因，是一些党的中央主要领导人未能正确对待自己党的历史和领袖。根据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辩证关系原理，无产阶级领袖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党的有机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在承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承认杰出个人、无产阶级领袖的重大历史作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本质上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由于领袖在党内的重要地位，所以，领袖个人的作用，他指导的对错与党的历史的曲直，与革命事业的兴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评价党的历史，评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必然要包含着评价领袖个人的历史作用和功过。问题是如何评价，用什么立场、理论、观点和方法去评价。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表明，如果不能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不能正确评价领袖的功过是非，会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后果。评价党和领袖个人的历史作用，只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去评价。社会主义制度在20世纪的产生和发展，对人类的进步与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使占世界人口1/3的人特别是那里的广大劳动人民摆脱了压迫和剥削，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也就是说，70多年来，共产党（包括它的领袖在内）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主

要的。因此，只要我们正确地总结成功的历史经验，吸取失误的教训，依靠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和力量，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就能克服前进中的困难，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相反，如果不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而是用所谓“民主化”、“公开性”等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党的历史和领袖，全盘否定历史，把党和人民用鲜血铸成的革命史描写成漆黑一团的“耻辱史”、“罪恶史”，把领袖的功绩一笔勾销，咒为历史“罪人”。结果就会使人民特别是不明历史真相的青年人失去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失去精神支柱和前进动力；就会为国内外敌对势力丑化、攻击党和社会主义提供炮弹；最后葬送无数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这一深刻而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一切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永远吸取。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13卷，第6页。

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226页。

③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5、221页。

⑤《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74页。

⑥⑧《列宁选集》第3卷，第788、789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292页。

⑨—㉒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5、13、13、36、36—37、37、331、16、16、42、42、325、331、338页。

（上接第29页）

动者积极性的最重要的经济原则和提高经济效益的手段，也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因此，加强企业管理一定要建立分配责任制。五是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制。提高经济效益，必须要有良好的企业精神状态，必须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因此企业要在党委的领导下，搞好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制，使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制度保证。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28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625页。

③ 《经济日报》1991年4月9日。

④ 《经济管理文摘》1991年第17期。

⑤ 《人民日报》1991年1月22日。

⑥ 《人民日报》1991年1月21日。

⑦ 《报刊文摘》1991年3月12日。

⑧ 《人民日报》1989年12月26日。